

钱玄同 评传



《国学大师》你绕不开的一座高峰

国学巨匠，百年经典，新眼指路！

大师们以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中国文化增添了瑰丽的色彩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钱玄同^{评传}



國學大師
叢書

趙標初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钱玄同评传/吴锐著. —2 版.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 3
(国学大师丛书)

ISBN 978—7—80579—516—4

I. 钱… II. 吴… III. 钱玄同 (1887—1939) —评传 IV. 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1133 号

书 名: 钱玄同评传

作 者: 吴锐

责任编辑: 钱 宏、关小群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 WWW.BHZWY.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6 万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定 价: 34.00 元

书 号: 978—7—80579—516—4

邮政编码: 330008 电话号码: 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國學大師叢書編輯委員會

《國學大師叢書》顧問(以姓氏筆劃爲序)

王永興	石峻	任繼愈	陰法魯	季羨林
周一良	姜義華	張岱年	龔書鐸	湯一介
趙樸初	劉桂生	戴文葆	戴逸	龐樸

組織編輯委員會成員：

桂曉風	熊向東	劉國藏	鄧光東	周榕芳
朱煥添	王志齋	範衛平	關小群	錢宏
彭開天	傅偉中	李晃生	朱光甫	毛軍英
尹飛舟	趙焜森	劉義林	董士偉	王守常
方鳴	錢文忠	傅修延	陳晋	宋志明
景海峰	趙麗雅	李曉崗	陳娟	黃卓越
陳駿濤	劉烜	魏漫倫	劉慶生	

叢書封面題簽 趙樸初

叢書總體編輯 錢宏

叢書肖像木刻 顏仲

总 序

ZONG XU

张岱年

总 序

Guo Xue Da Shi Cong Shu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

輩，……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褊，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葑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覿，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美。”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

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总 序

Guo Xue Da Shi Cong Shu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CHONG XIE JIN DAI ZHU ZI CHUN QIU

《国学大师丛书》在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下，就要陆续与海内外读者见面了。

当丛书组编伊始（1990年冬）便有不少朋友一再询问：为什么要组编这套丛书？该丛书的学术意义何在？按过去理解，“国学”是一个很窄的概念，你们对它有何新解？“国学大师”又如何划分？……作为组织编辑者，这些问题无疑是必须回答的。当然，回答可以是不完备的，但应该是明确的。现谨在此聊备一说，以就其事，兼谢诸友。

一、一种阐述：诸子百家三代说

中华学术，博大精深；中华学子，向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著称于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出现过三个广开风气、大师群起的“诸子百家时代”。

第一个诸子百家时代，出现在先秦时期。那时，中华本土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演进，已渐趋成熟，老庄、孔孟、杨墨、孙韩……卓然颖出，共同为中华学术奠定了长足发展的基脉。此后的千余年间，汉儒乖癖、佛入中土、道教糅生，中华学术于发展中渐显杂陈。宋明时期，程朱、陆王……排汉儒之乖、融佛道之粹、倡先秦之脉、兴义理心性之学，于是，诸子百家时代再现。降及近代，西学东渐，中华学术周遭冲击，文化基脉遇空前挑战。然于险象环生之际，又一批中华学子，本其良知、素养，关注文化、世运，而攘臂前

行，以其生命践信。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黄侃、陈寅恪、钱穆、冯友兰……他们振民族之睿智，汲异域之精华，在文、史、哲领域筚路蓝缕，于会通和合中广立范式，重开新风而成绩斐然。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遂傲然世出！

《国学大师丛书》组编者基于此，意在整体地重现“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之盛况，为“第三代”中华学子作人传、立学案。丛书所选对象，皆为海内外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对经、史、子、集博学宏通，但治学之法已有创新；他们的西学造诣令人仰止，但立术之本在我中华从而广开现代风气之先。他们各具鲜明的学术个性、独具魅力的人品文章，皆为不同学科的宗师（既为“经”师，又为人师），但无疑地，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学术理论又具有其时代的共性。以往有过一些对他们进行个案或专题研究的书籍面世，但从没有对他们及其业绩进行过集中的、整体的研究和整理，尤其未把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的群体（作为一个“大师群”）进行研究和整理。这批学术大师多已作古，其学术时代也成过去，但他们的成就惠及当今而远未过时。甚至，他们的一些学术思想，我们至今仍未达其深度，某些理论我们竟会觉得陌生。正如第一代、第二代“诸子百家”一样，他们已是中华学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研究他们，也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本身。

对于“第三代诸子百家”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整理，我们恐怕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展开。《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织编辑，是一种尝试。

二、一种观念：一代人有一代之学术

纵观历史，悉察中外，大凡学术的进步不能离开本土文化基脉。但每一代后起学子所面临的问题殊异，他们势必要或假古人以立言、或赋新思于旧事，以便建构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学术。这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在每一代学子身上的最好体现。以上“三代”百家诸子，莫不如是。《国学大师丛书》所沿用之“国学”概念，亦当“赋新思于旧事”而涵注现时代之新义。

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四杰继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Guo Xue Da Shi Cong Shu

起，矫道统，斥宋儒，首倡“回到汉代”，以表其“实学实行实用之天下”的朴实学风，有清一代，学界遂始认“汉学”为地道之国学。以今言之，此仅限“国学”于方法论，即将国学一词限于文字释义（以训诂、考据释古文献之义）之范畴。

《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所谓国学就其内容而言，系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此其一；其次，既是中国学术便只限于中国学子所为；再次，既是中国学子所为之中国学术，其方式方法就不仅仅限于文字（考据）释义，义理（哲学）释义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综合起来，今之所谓国学，起码应拓宽为：近代中国学子用考据和义理之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之学术。这些文献，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为经学（即“六经”、实只五经）及文字训诂学；史部为史志及地理志；子部为诸子及兵、医、农、历算、技艺、小说以及佛、道典籍；集部为诗、文。由此视之，所谓“国学家”当是通才。而经史子集会通和合、造诣精深者，则可称为大师，即“国学大师”。

但是，以上所述仍嫌遗漏太多，而且与近现代学术文化史实不相吻合。国学，既是“与西学接触后的中国学术”，那么，这国学在内涵上就不可能、也不必限于纯之又纯的中国本土文化范围。尤其在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建构方式上，第三代百家诸子中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师们，事实上都借用了西学，特别是逻辑分析和推理，以及与考据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实证方法，还有实验方法、历史方法，乃至考古手段……而这些学术巨子和合中西之目的，又多半是“赋新思于旧事”，旨在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范式。正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我们今天使用语言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乃得之于斯！如果在我们的“国学观念”中，将他们及其学术业绩排除在外，那将是不可理喻的。

至此，《国学大师丛书》之“国学”概念，实指：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的总称。“国学大师”乃“近现代中国有学问的大宗师”之意。因之，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固为国学，以探究义理心性为特征的“宋学”及兼擅汉宋者，亦为国学（前者如康有为、章太炎、刘



师培、黄侃，后者如陈寅恪、马一浮、柳诒徵)；而以中学（包括经史子集）为依傍、以西学为镜鉴，旨在会通和合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当为更具时代特色之国学。我们生活在九十年代，当取“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国学）的观念。

《国学大师丛书》由是得之，故其“作人传、立学案”之对象的选择标准便相对宽泛。凡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并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现代风气之先以及首创新型范式者皆在入选之列。所幸，此举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当今学界老前辈的同情和支持。

三、一个命题：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即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全面评价和把握他们的学术成就及其传承脉络。唯其贯通近代诸子，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认清中华学术的发展道路，了悟世界文化的大趋势，从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



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

钱宏（执笔）

1991年阳春节初稿

1992年立春节修定



序

刘宝才



序

Qian Xuan Tong Ping Zhuan

吴锐同志专著《钱玄同评传》完稿我很高兴，但作者要我写序时我却踌躇了。这本书的序应该由一位更有研究的专家来写，不该由我来写。不过，我又极愿意把作者介绍给读者诸君。

1989年吴锐同志从中南民族学院来到西北大学学习中国思想史，使我得与这位土家族青年相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谦和而文弱，并不外露才华。接着读了他的几篇文章，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熟悉古史、才思敏捷，讨论古史问题时不但能自如地引用经史诸子，还能熟练地运用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资料，提出自己的新颖见解，这在我接触过的硕士研究生中是独一无二的。后来，我们俩合编《诸子选注》，由于时限较紧，我担心不能如期完成，向吴锐同志说：“你的业务水平我了解，但工作作风还不很了解。”结果他很快作完了注释，注文详略适宜、释意准确，还对一些选目提出了增删意见，已由湖南出版社出版。

吴锐同志在西北大学学习三年，专心致志于上古社会与思想研究。他的乐趣就是读书，每每在一间借用的房子里读书到午夜。每隔几日不见，相见时他谈的都是读书心得。他的唯一业余爱好是音乐。他带着二胡去西安音乐学院拜了一位教师，每周去请教一两次。平时读书累了，拉



几首二胡曲，接着继续读书。于学问如此专注，于俗务如此恬淡，如今实不多见。我不知道这对于他个人利弊如何，却以为这种精神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需要而可贵的。

几年来，我们切磋学问、交流思想，建立起深厚的友谊。现在吴锐同志取得了博士学位，在学业之余又写出了专著，可见他的学问进步很快，也可知他从学之刻苦努力。祝愿他不断有新成果问世！

至于本书所研究的钱玄同，是近代国学的一员健将，无须多说。这里只想提及一点，钱玄同是一位与时俱进的学者。他虽英年早逝，只活了53岁，而他的思想发展却反映着一个时代。他接受过章太炎的影响，又推崇过康有为、崔适，而在“五四”时期不但打破今、古文经学的“家法”，而且冲出经学，投入《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一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揭幕人，后来又在古史辨营垒中成为中坚。他的学术方向发展与思想认识深化分不开。辛亥革命前后，他曾认为排除满族政权、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就是大功告成，接着恢复汉族的古代文化便可达到理想境界。到了“五四”时期，却认识到理想不能在复古中，必须在前进中寻求。钱玄同的一生没有离开国学，而他晚年的著作集中于国学的文字音韵方面，大约可以表明他对国学价值所在的一种看法吧。

这本《钱玄同评传》，在近代国学发展和启蒙运动的背景下评述了钱氏的生平事业，给予读者的当不止是对于一位国学家的认识，而是对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认识。至于书中的精到见解和历史反思，相信读者会自有明鉴，亦毋庸赘言。

1994年10月3日

钱玄同评传

Qian Xuan Tong Ping Zhuan

PRÉCIS

(英文提要)



英文提要

Qian Xuantong Ping Zhuan

Qian Xuantong came from a typical Chinese intellectual family in the end of the last feudal dynasties. Having recepted 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rom childhood, he worshiped Qing Dynast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or a long time. In 1913, he came in Beijing and taught in many universities. His academic life matured his thought. In 1917, he began to contribute articles to "New Youth" to support Literary Revolution. He proposed the slogan "Down with Selected Works School and Tongcheng School" and reverberate through the whole contry. He became one of the editors of "New Youth" and one of the leader of New Culture Movement. From then on he began to attack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very fiercely. He argued only Mr. Democracy, Mr. Science and Ms Moral could save China from backward situation. Frurthermore, he thought reforming Chinese people's though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1921, "New Youth" faled the crisis of stopping publication. This year he wrote to Hushi and Gu Jiegang to discouss collecting and compiling articles on distinguishing false books and

false history of past dynasties. He especially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articles which distinguished false Confucian classics. Their discussing directly caused The Movement of Distinguishing History, then he became one of the pioneers of this movement. At the same time, he published many articles about Xiao Xue (study of ancient forms, phonology and meaning of written language) Confucian Classics,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many views were valuable even up to now. As the radical representative of fighting tradition, he even chose "Doubting the Ancient" as his alias.

Qian Xuantong devoted his life to educated young men and arouse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He worked earnestly for "the greatest majority" to get "the largest happiness" like he always says. The concrete work he did was Guo Yu (Modern Chinese.) He was one of the chief commanders of "Guo Yu Movement". All in all, he was not only a great master of Chinese Studies, but also an enlightening thinker.

Qian Xuantong once said what he researched were Xiao Xue and Confucian Classics, He was not interested in political affairs. Under chaotic circumstances of all his life, this upright scholar investigated the origin of China's misfortune, he found Chinese people's thought were too old to keep with the time, so he made up his mind to arouse the people. His aspiration seems hard to bring to fruition even up to now.



引 论

引 论

Qian Xuan Tong Ping Zhuan

在中国历史上，每到存亡关头，就有人出来总结社会的变迁，表达对新时代的愿望，而且他们通常使用“三分法”。例如荀子就说过，“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这实际上暗示了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商君书·开塞》明确地把社会的演进区分为“三世”，说“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西汉董仲舒首先提出“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并比附于“三统说”，像后来的《白虎通》，还依旧在黑、白、赤三统上兜圈子，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循环论。东汉末年何休则集今文经学之大成，直接将董生“有见、有闻、有传闻”发展为“三世”说，即“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粗，故内其国而外诸夏”；“于所闻之世，见治所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这种“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过了1000多年竟死灰复燃，特别是经康有为淋漓尽致地发挥，并与西方政治思想结合，引起了思想界的极大震动。《公羊传》所描绘的“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如线”的危机竟奇妙地成为晚清国势的写照，为存国保种计，有戊戌变法的昙花一现；有西学与中学的斗争；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较量……晚清有一位自称好“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的思想家龚自珍，自云“少年尊隐有高文”，在他写的《尊隐》中，他托言“古史氏”，把历史变迁分为三期，第一期、第二期相当于早时午时，君子生此时际，乐看“京师”之繁荣，人民是尚能安于野的。然而到了第三期“夕时”则不然，那是一番“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